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丛书

未来的社会主义

● 戈尔巴乔夫 ● 勃兰特 等著

中央编译局国际发展与合作研究所编译

FUTURE OF
SOCIALISM
SOZIALISMUS
DER ZUKUNFT
БУДУЩЕЕ
СОЦИАЛИЗМА
FUTURO DEL
SOCIALISMO
SOCIALISME
DEL'AVENIR

中央编译出版社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丛书

未 来 的 社 会 主 义

戈尔巴乔夫 勃兰特等 著

中央编译局国际发展与合作研究所编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4 年·北京

(京)新登字 305 号

*

Der Sozialismus der Zukunft

Die Neue Gesellschaft/Frankfurter Heft

Sonderheft 1 1990

Sonderheft 2 1991.

Verlag J. H. W. Dietz Nachf. Bonn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未来的社会主义:当代世界和社会主义/(俄)戈尔巴乔夫
(Gorbachev, M.) 等著;中央编译局国际发展与合作研究所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 1

ISBN 7-80109-000-4

I. 未…

I. ①戈… ②中…

II. ①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世界 ②现实社会主义

IV. D038.4

*

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邮政编码:100032)

北京朝阳科普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4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400 千字 印张:15.25

印数:6000—9000 册 定价:12.8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缺面破损,请寄回更换)

62F39/5

前 言

本书是根据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社会/法兰克福杂志》两期以未来的社会主义为主题的特刊编译而成的。这些特刊也可以说是一份国际性杂志最初两期的德文版。在1989年至1990年苏联东欧发生剧变时，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书记阿丰索·盖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副主席奥斯卡·拉封丹共同建议设立一个国际论坛，供他们所理解的最广泛意义上的“欧洲左翼”就“未来的社会主义将是怎样的”这一问题进行自由的讨论。根据这一建议，西班牙的《体制》基金会在1990年春天创办了以《未来的社会主义》为名称的杂志，并打算除西班牙文版外还同时用意、英、德、法、葡等5种文字出版。与此同时，基金会还把出版这一杂志的俄文版列入它与原苏联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的合作计划。我们迄今见到的只有这两期德文版特刊和俄文版第1期。德文版两期特刊的标题是《社会主义的未来》，先后于1990年夏和1991年夏出版。俄文版第1期与德文版第1期内容相同，名称为《未来的社会主义。政治辩论杂志》，并标明“第1卷第1期，1990年”。

这两期特刊的作者的政治面貌是多种多样的。例如：

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共产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戈尔巴乔夫、弗罗洛夫（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真理报》前总编辑）、沙夫（波兰科学院院士）、弗兰尼茨基（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大学校长、政治学教授）。

西欧一些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卡里略（原西班牙共产党主席、现为西班牙工人党主席）、克劳丁（曾任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后退党，已故）、纳波里塔诺（原意大利共产党议员、意大利议会外交和共同体委员会主席）、埃伦斯坦（历史学家、曾为法国共产党党员，后退党，现为《宇宙》杂志主编）。

西欧各国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勃兰特、拉封丹、盖拉、罗卡尔（法国社会党领导人之一，前政府总理）、特扎诺什（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联邦执行委员会教育书记）、埃普勒（德国社会民主党联邦执行委员会成员、基本价值委员会主席）。

左翼知识分子：米利班德（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新马克思主义者）、科皮（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希默尔施特兰德（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教授）。

托派第四国际主席芒德尔（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经济学教授）。

他们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分析了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和这些国家的发展前景，论述了西欧各国共产党和社会党的经验和问题，对欧洲和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的未来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其中有些观点无论从研究还是从批判的角度来看都是值得重视的。这里将它们的主要内容综合介绍如下：

这些文章发表的时间虽然有先有后，但都是在苏东剧变开始之后写的。那时候大部分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已经或即将丧失政权，苏联的混乱日益加剧，整个形势虽未最后定局，但趋向已基本明确。对于这一形势，作者们普遍采取肯定和欢迎的态度，认为这是“反独裁统治的民主革命”，或甚至是“起义”。他们普遍对这些国家的“现实社会主义”作了激烈的批评和攻击，但也有一些文章对十月革命以及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特别是早期）作了肯定的评价，甚至芒德尔也不得不承认共产主义的“局部成就”。有些作者表示希望这些国家今后的发展仍旧不要脱

离社会主义的方向。例如维尔布兰(原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和佩利康(意大利东西方研究所所长)论述了自己对这些国家发展前景的看法,后者还详细分析了1990各国选举的结果,认为左翼(主要由于分裂)失败了,但右翼并未胜利,今后最好能由一个或几个社会主义政党掌握政权。绝大多数作者认为在这些国家中应当以多元化议会制民主取代原来的制度,但也充分估计到这样做的困难。有些文章认为特别需要警惕的是,少数野心家可能利用群众在生活上的不满,煽动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情绪,夺取政权,建立新的专制统治。

在经济方面,这些文章认为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国有化、农业集体化以及否定市场机制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已彻底失败,特别是佩利卡尼(意大利《工人世界》杂志主编)的《集体主义的反经济》一文对这一问题作了详细的分析。但有的文章反对在这些国家实行全面私有化,认为建立以公有制经济为主的混合经济仍是切实可行的。不少作者认为,在这些国家取消统一的经济计划,走向市场经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能反过来完全迷信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米利班德认为,国家固然不能够把计划贯彻到经济活动的每一个细节,但这不等于说,民主国家不应当规定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优先项目并对市场机制进行调节。国家还必须为广泛的集体服务如保健、教育、交通、生活服务设施、环境保护等承担责任,不应听任这些服务完全受市场规律支配。希默尔施特兰德在《社会主义的前途》一文中还根据瑞典的情况论述了社会民主党如何以妥协办法克服市场机制局限性的经验。勃兰特一方面认为,“对经济权力实行社会控制并不排除市场关系,而恰恰包括市场关系在内。同中央集权官僚体制曾经做到的相比,凡是有意识地不使市场摆脱责任的地方,市场都是社会对经济决策施加影响的更有效的工具”;同时又强调必须充分考虑目前各国经济高度的相互依赖性:“我们赞成经济竞争,但我们反对盲目地崇拜一般的市场,尤其反

对盲目崇拜世界市场。因为我们打算从政治上即以对公众负责的态度影响市场规律,所以我们必须赞成密切的国际合作。自行其是只能走进死胡同,因为民族国家的调节很容易受到国际性企业和银行的破坏。”

在从社会主义理论角度探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制度崩溃的原因时,绝大多数作者认为这是因为,苏联实行了“斯大林主义模式”并把它强行推广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但一般并不把这简单地归咎于斯大林个人,而是认为这是由于这些国家本来并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的客观和主观条件而造成的,而且列宁也要对此负责,斯大林不过是把列宁的某些理论推向极端而已。因此,大多数作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明确表示怀疑。《新社会/法兰克福杂志》主编格罗茨在德文版特刊第1期中的社论中说,戈尔巴乔夫在为自己的改革提供论证时谴责斯大林,却仍旧坚持列宁的理论,他认为,“这是一种遭到西欧社会民主党坚决拒绝的立场”。同一期上的《纲领性声明》则进一步主张在讨论中“必须实行绝对的批评自由,而且任何人都不会处于不受怀疑的地位,这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只要能够证明他们的某些论点在与实践的冲突中是错误的或者必须转换成新的现代表述形式,对他们也不例外。”实际上,大多数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已被证明为不符合实际的,而埃伦斯坦的文章仅仅从它的题目(《马克思主义正在死亡,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社会主义万岁!》)来看就典型地说明了问题。作者在简要地回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以后说:“现在是把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全部埋葬的时候了”。当然,许多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思想史和世界文化史中的重要地位及其某些观点的现实意义仍旧是承认的。盖拉在《新的和旧的社会主义》一文中强调应对迄今的从事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前辈”表示真诚的感谢。沙夫在主张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时坚持认为,马克

思主义对于未来的社会主义仍旧是有效的。

芒德尔的文章与其它作者的调子不一样,这是他的托派立场决定的。他认为,社会主义危机的根源不在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有什么重大的缺陷,而在于社会主义者的实践背离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因此,“社会主义的危机实质上是社会主义者的实践的危机”,这种实践既包括“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的历史性失败”,也包括“改良主义渐进论的各个变种(欧洲共产主义和第三世界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内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失败”。他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也持否定态度。芒德尔在否定了苏联、东欧、西欧和中国的所有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后认为,历史已经证明,罗莎·卢森堡关于“本世纪的基本趋势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矛盾日趋尖锐”的论断是正确的,而伯恩施坦关于资本主义矛盾日趋缩小的论断是错误的。这是目前西欧托派常常使用的论据。芒德尔在文章中指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格罗茨也承认欧洲社会党人在讨论中往往忽视了这些问题。但是芒德尔提出的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方案是非常脱离实际的,这就使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成了虚声恫吓。

本书的作者们在探讨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和影响时还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情况,这就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和理论家的反应。目前在这些国家中执政的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政党领袖及其舆论喉舌把苏联和东欧剧变看成整个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也包括民主社会主义在内)的失败,并力图利用这一机会否定社会主义的前途和侵犯劳动人民的利益。佩利卡尼在他的文章《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中列举了从撒切尔夫人到哈耶克的一系列这样的言论,指出“保守的新自由主义者打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旗号向福利国家发动了反扑”。特扎诺什的文章《《社会主义和社会进步》》着重批判了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企图把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永恒化的论点。勃兰特也指出:“以强凌弱的心理

状态和早就被认为已经得到克服的曼彻斯特自由资本主义的粗野方法再次得到流行。由于受到东亚经济发展的迷惑,有些保守的‘现代化者’想要极力压缩国家的社会福利。但是,他们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撒切尔主义的努力将继续遭到民主社会主义力量的反对,而且这些反对多半会有成效”。

本书的作者们就是在上述总的背景下探讨社会主义的未来的。如上所述,有些文章在分析苏联东欧剧变时实际上已触及这个问题,而且不少人显然是站在民主社会主义立场的。勃兰特首先说:“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在斯大林之后出现的危机,证实了那些从民主社会主义角度不仅揭示了彼此之间程度上的差异、而且指出了原则对立的人们的观点。”这就是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崩溃证明社会民主党和民主社会主义是正确的。克劳丁也说:“用共产主义理论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的衰亡,加上西方共产党的不可逆转的危机”已使“社会民主党成为唯一传播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重要力量。东方的那些企图保留他们的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的改革运动,都把目光转移到社会民主主义上来。同样,西方的还能起一些政治作用的少数共产党也这样做了”。戈尔巴乔夫在《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一文中也承认,今天在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已不存在从前那样的鸿沟,双方尽管对基本价值的理解仍有差别,但在政治立场上和世界观立场上都接近了。

卡里略的文章也证实欧洲共产主义实际上已接受了民主社会主义。佩利卡尼在驳斥新保守主义的观点时肯定地说:“社会民主主义时代并没有结束”,同时也指出:“尽管社会民主主义的模式有其局限性和不足,但社会主义仍旧是唯一能够不用牺牲平等而获得自由的制度化的运动。虽然社会民主主义的战略肯定并没有给我们带来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它至少能够使资本主义‘文明化’,并且使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不那么残酷无情和非人道。”

尽管如此,谁也不能否认,社会民主党本身也存在许多问题,

而且有些是严重的。正如克劳丁所说：“社会民主党的阵营决不当因为这个论断而产生胜利的感觉。它们自己在对待意识形态革新和在政治上适应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变化着的世界等方面也存在着问题。”他认为，无论是“现实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党都未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的和工会的斗争促使对资本主义的弊病作出了决定性的修正，然而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并没有被取消”。希默尔施特兰德在《社会主义的前途》一文中列举了瑞典社会民主工党在执政中遇到的5个严重的挑战：1、传统的社会民主党选民的社会分裂；2、公有经济成分的效率和社会福利事业的财政支出；3、环境问题和生态运动；4、失业问题；5、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所造成的文化矛盾——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心态与团结互助的结构改良要求之间的矛盾。另一位研究瑞典社会民主党的专家科皮在分析“瑞典模式”的经验时也指出，瑞典社会民主工党在90年代的处境“非常困难”。尽管它在30年代和50年代曾经通过采用新的政策而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但到了80年代，它已不能依靠一种新的经济思想，只能倒退到“通过提高赢利来改善私营企业的环境，同时要求工会忍受工资限制并且使工人保持平静”，而这一战略对于社会民主党政府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此文发表后不久瑞典社会民主工党就因在大选中失利下台）。

因此，本书的作者们在展望和分析社会主义的未来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共产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传统对立而更加看重新时期的物质和社会条件的影响，并据此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值得思考或反思的问题。当然，他们的观点决不能完全摆脱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有时甚至相当强烈地表现出这一立场。

在德文版第1期的《社论》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未来的社会主义是什么？人们是应该把目前的社会党所推行的现实政策称为“社会主义”呢？还是“应该根据最近几十年的模式转变而要求变更概念，实行重大的历史转折，与长期受到尊敬的象征告别呢？”同

一期的《纲领性声明》实际上已对这一问题作了初步的回答。《声明》中说,人类在 20 世纪末已进入一个新的工业革命时代,这场工业革命所引起的社会生活的根本变革就其规模和速度而言可能将远远超过第一次工业革命。由技术发展而产生的结构性失业将在今后二、三十年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分层结构的决定性变化:今天这样的工人阶级将逐渐减少甚至消失,资本家阶级的作用和社会地位也将改变。有可能出现一个“新的有产阶级”,他们是新的生产资料即知识和信息的所有者并且力图发展成一个“新的统治阶级”。这些情况将使人们在不远的将来不可避免地对于既作为社会制度、又作为政治运动的社会主义产生新的观点。沙夫在《当代社会主义的“空白领域”》一文中也针对不久的将来提出社会主义理论应当研究的一系列主要问题。在经济方面有:未来社会主义中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与私人所有制的关系,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集权制与分权制的关系。在社会阶级结构方面有:将会出现哪些阶级?能否有一种没有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在政治形式方面有:国家与民主、政治多元化与一党制的关系。此外还有:造就社会主义新人与“伦理社会主义”的作用等等。

上面提出的问题涉及一个根本的理论观点:谁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主体?论述这一问题的作者一般是从两个方面来考虑的。其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将导致传统意义上的劳动的消亡以及随之而来的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的消失。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工程师、管理人员和自动化生产的操纵人员并不会取代工人阶级过去的位置,而是会形成一个新的“占有者阶级”,并在一定程度上变成“统治阶级”。与此同时,社会上的中产阶级将随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不断缩小而日益扩大,也就是说,社会将“中产阶级化”。这就产生了新的社会将由谁统治谁的问题。其二是:新的社会运动迫使人们对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反思。《纲领性声明》中提到了裁军与和平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妇女问题、青年问题以及

其它许多问题。沙夫还特地提到了“一种与宗教相联系和以道德原则为基础的革命的(反资本主义的)群众运动”。拉封丹的《社会主义与新社会运动》一文专门论述了社会民主党对待新社会运动的态度和政策。他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和新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必须超出政治左派的两个社会势力的和平共处的范围,而形成一种“共生”。他说:“我只能把社会主义设想为一种‘运动’,它也从其它许多左翼运动中汲取精神的和政治的动力,但是这种动力与这类运动的短暂性相比,是由一个全面的计划武装起来的。因此社会主义运动不能当作一种时髦商品来推销,它的批判锋芒也不能被剥夺和磨光。”特扎诺什认为,社会主义的产生不是只有一个“动力因素”,产生不幸、依附关系、异化、剥削、贫困等等的原因也不是只有一个。因此,未来的社会主义必将放弃过去的“以劳动为中心的”和“经济主义的”观点,并且必将以对社会的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为出发点。与此相应,也必须“从唯一的革命主体的理论转向社会主义主体的多元性。”

另一个重要观点是,大多数作者把社会主义理解成一个对现存社会不断进行改良的长期运动。克劳丁说:“我认为,社会主义不过是一个在更多的自由和社会公正的意义上改变现存社会的实在的运动。理论上的思想体系可以预见这个运动的发展,并为其政治实践提供动力,却不能用来臆想出一个社会必须适应它的理想的图式。很可能以后会有那么一天,那个时代的人会约定将他们的社会与从前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彻底区别开来。”卡里略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不是“量的”而是“质的”:“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终究将是继资本主义之后的,并战胜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中间阶段,它们是取决于生产力的实际发展的。”他提出一些看法:第一,不要把还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称为社会主义;第二,必须考虑到可以从资本主义遗产中找到不少实现社会主义的工具。他说:“今天某些为资本主义机构服务

的东西也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只要用国际层次的政治行动来改变它们的实质就行”;而且“在资本主义本身中正在形成一些与其说是适应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不如说是适应社会主义世界经济所需要的工具和结构。”因此他建议“制定一个能消除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对立的改革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纲领。在这个纲领中必须预先确定要实现的目标和阐明要在国际层次采取的措施。”他还用原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奥凯托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坚强的改良主义”的纲领。他的这种意见与社会民主党是基本一致的。

上述问题在某种程度与国际工运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关于“目的和运动”的争论有联系,而实际上有些社会党领导人在谈论社会主义的未来时更多地着眼于当前和最近将来的国际国内政策,带有相当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对于这一情况,沙夫是反对的。他一方面承认“我们不打算预见未来。因为在出现如此众多变化和未知因素的情况下,未来学无法对未来社会进行精确详细的描述”;另一方面仍强调:“人们必须有能够指出发展目标意识形态”,并且说:“我仍旧听到有人用惋惜的口吻重复改良主义的陈旧‘经验’并固执地认为目标是微不足道的。这是不正确的!如果没有目标就无法认识为达到这一目标所要经过的整个道路。……没有明确目标的‘道路’必然要遭到失败,同样也是短命的。”当然,沙夫的这种批评意见只能说明他们彼此之间在色调上的差别,因为整个说来,本书的作者们(芒德尔除外)都是主张走改良主义道路的。

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理论的另一个中心问题是民主。民主是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之间长期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也是当前欧洲和世界政治现实中的一个关心的焦点。社会民主党一直把民主理解成抽象的一般民主,认为民主既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也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本身。在本书中有许多作者从各个角度考察了这一问题。克劳丁认为,两次世界大战和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经验教训

已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民主的价值以及团结起来保证和捍卫民主的必要性。社会民主党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担当了先锋的角色。在它们的意识形态和实践中，表示局限性的‘资产阶级民主’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消失了，不附加任何修饰词的民主本身成为一种价值，即虽然不是社会进步唯一的前提条件，却是任何社会进步都必需的条件。”他还说，西方的共产党也同样接受这一发展的影响，“在当前，20世纪伟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成就是民主的巩固和发展，它将影响到21世纪。”这些言论和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已没有什么区别了。卡里略则更多地从西欧国家的现状出发来考虑问题。他以法国为例，指出资产阶级政党已分裂为愿意坚持民主原则的左派和与民族阵线串通一气的右派，后者奉行那种曾使法西斯主义通过议会途径在德国和意大利夺取政权的策略，因此“人们看到，民主的未来毫无保障，它需要我们经常保持警惕并进行政治斗争”。他也进一步驳斥了那种认为在技术统治的时代没有意识形态的地位，因而左派和右派的对立已经过时的理论，认为虽然在保护自然界和反对核灾难等问题上很多思想右倾的人会赞成社会党的政策，但这不等于说已不再存在右派和左派的差别。右派的意识形态反对民主、人权和人道主义，在一些民主制相当稳固的国家中也有突出表现，甚至渗透到具有传统左派倾向的群众之中，利用民众主义为煽动手段，这就要求左派保持警惕。

沙夫在论述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时提出一个问题：专制与极权的上层建筑或共产法西斯主义的上层建筑是否能存在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他认为，苏联和东欧国家从经济基础即生产资料公有制来说确实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具备必要的主观条件，因此上层建筑未能与基础适应，结果成为“共产法西斯主义”，而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一观点与考茨基以来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在实质上是一致的，但沙夫的一个新观点在于，他认

为在未来,随着传统社会阶级(首先是工人阶级)的逐渐消亡,有可能产生新的有产阶级(它掌握着像信息这样的生产资料),“这个由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等等组成的新阶级有可能依靠部分官僚体制和旧的有产阶级的残余变为统治阶级,从而有产生社会斗争的危险并由此导致极权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社会是以集体经济为基础,就有可能产生新型共产法西斯制度。”

本书作者们提出的问题还有生态问题、技术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向及其引导问题等等,这些都是目前西方国家关于社会主义和社会进步的讨论中经常涉及的,这里不打算详细介绍。但有一点需要着重提到,这就是当前日益加强的世界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性与未来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勃兰特指出:“在历史上,我们第一次能够谈到交通、远程通讯、经济关系以及货币和资本流通的真正全球化。世界上某一地区的经济发展从未像现在这样对全球各地造成如此直接而长远的影响”,而且,“不受控制的工业主义会造成全球性破坏——尤其在环境方面”。不过他认为“当前的环境危险在许多地方已经有利于开创性的意识转变,危险是超越社会制度的。”因此他主张:“朝着全球性政策发展的长期趋向也要求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对国际主义有新的理解”。这里的核心问题就是南北关系问题。纳波里塔诺、希默尔施特兰德、卡斯特尔斯等人的文章都以许多篇幅谈到这一问题。罗卡尔和埃伦斯坦则把这一问题和当前法国社会党对欧洲共同体的政策联系起来讨论。埃普勒的《欧洲的紧密结合和世界范围的共同体》一文把欧洲共同体与南北关系结合起来分析,尖锐地指出南北关系在最近十年来比上一个十年更加“令人悲哀”,“南北之间没有作过一次真正的对话”,在国际会议上南方的要求常常遭到拒绝,北方对南方的援助是微不足道的等等问题。他主张“创造一个面向南方、对南方开放的欧洲”。他说:“关于只有一个地球的意识以及从而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世界政策的意识,借助生态要比通过经济能够更迅速、更彻底地

渗透到人们的心目中。欧洲可以成为这样一块大陆,使这种意识在这里,首先在政治决策中、在政治机构中、甚至在宪法中得到反映”。

上面提到的言论和观点涉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些重要问题。本书作者们的观点在许多方面是与马克思主义者不一致的,甚至是对立的,其中芒德尔否定一切的极“左”立场、沙夫关于“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埃伦斯坦关于“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的观点等等尤其需要加以分析和批判。但另一方面,这些文章整个说来反映了欧洲当前各社会主义流派的主要观点,具有高度的代表性,是我们在研究苏联东欧剧变后世界政治形势、特别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前景时必须了解和考虑的。因此,我们把这两期特刊编译出来,供我国从事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工作的同志及有关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参考。

本书由中央编译局国际发展与合作研究所组织译校。大部分文章是根据德文译出的,少数文章从俄文或参照俄文译出,每篇文章后都对此作了说明。殷叙彝负责统阅全部译稿并写《前言》,张世鹏负责技术规格工作。

1992年10月

目 录

《新社会/法兰克福杂志》特刊《未来的社会主义》

第1期(1990年)社论

彼得·格罗茨	(1)
纲领性声明	(4)
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8)
民主社会主义的未来	
维利·勃兰特	(24)
旧的和新的社会主义	
阿丰索·盖拉	(39)
社会主义与新社会运动	
奥斯卡·拉封丹	(58)
当代社会主义的“空白领域”	
亚当·沙夫	(72)
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	
费尔南多·克劳丁	(122)
社会主义的状况和未来	
欧内斯特·芒德尔	(132)
未来的社会主义	
焦尔焦·纳波利塔诺	(172)